

觉 醒

冲破女性的奥秘

不 断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要写《女性的奥秘》？”你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使你涉足女权运动？”我从不知该如何作答。因为，我开始建构女权运动并非经过深思熟虑；我对妇女问题事实上从未产生过特殊兴趣。我怎么碰巧写了《女性的奥秘》现在看来几乎纯属偶然。就像荣格^①八十岁后分析自己童年时代的梦境那样，我感到“只是在我一生中非常晚的时候，其中的关联才变得清晰起来”。整个事情——它为什么会发生，它是如何开始的，都是一个谜。是什么给了我们所有人以那奋力一跃的勇气？有时，我感到我们仿佛只是在演绎人类进化过程中命定的一章，就像荣格学派的原型：“他们行动在前，并不清楚自己正在做什么。只是在很久以后，他们才会反省自己曾做过什么。”

^① 荣格(Carl Jung 1875 - 1961)，瑞士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首创分析心理学。

反省自己，我现在才明白，我们的运动不需要任何奥秘，它只是及时地发生在历史需要的那一刻。社会的进化、男性营造的科学技术，都将妇女引上了这样一个出发点：我母亲那一代就已在酝酿之中的大规模的共同性危机，到我这一代美国妇女时已日臻成熟。而我自己生活环境中的某种关联，更是将我置于与这种危机针锋相对的地位，并且最终赋予我理解它、将其他妇女的现实经验形诸文字的能力。

在某种意义上，我写《女性的奥秘》几乎是偶然的——纯属巧合的，而在另一种意义上，我的整个一生都在为写那本书做准备。在写作该书时，我自己生活中的所有碎片才第一次串联到了一起。

这里有我的母亲，有她的满腹牢骚，对她的这种牢骚我不理解。我不想步我母亲的后尘。我父亲所做的一切，他为她买的一切，我们所做的一切，竟然似乎没有一件令她满意。她嫁给我父亲时，不得不放弃了她在皮奥里亚一家报纸妇女版的编辑工作。我还没上初中，她就急不可耐地把下面的主张灌输到我的头脑中，鼓励我参加校报的选拔，在高中创办文学杂志。她恨不得让我马上进入那所她自己从未有机会上的大学，去编辑那里的报纸。也正是在该学院，我学到了弗洛伊德学派对我母亲无力寻找到作为一名妇女的“自我实现”的解析。我自己也开始成为一位心理学者，而且由于那些伟大的格式塔^①心理学家不得不从纳粹德国逃离，我得以向史密斯学院的科特·考夫卡^②、爱荷华学院的科特·列文^③以及伯克利学院的埃里克·埃里克森^④学

① 格式塔(gestalt),始于德国的心理学概念,强调整体不是其组成部分的相加,而有其自身的特性

② 科特·考夫卡(Kurt Koffla),德国心理学家,格式塔心理学派的创造人之一,后移居美国。

③ 科特·列文(Kurt Lewin),德国心理学家,后移居美国。

④ 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德国心理学家,后移居美国。

习 学习如何在全部、具体、文化的环境（即格式塔）中看待一切现象，包括我母亲的挫败感。

于是，我获得了权威著作与工具，利用它们，我最终能够洞穿弗洛伊德学派关于女性奥秘的学说。也是在史密斯这所伟大的女子学院，我被认真地当做一个人对待，并受到谆谆教诲，了解到对人类命运的根深蒂固的责任感，以及我所拥有的影响人类命运的力量。不过，尽管我满怀激情地反对不公正（还自不量力地认为我能为终止这种不公正尽一臂之力），这种激情却只是到了很久以后，才聚焦到妇女乃至我自己身上（尽管这种激情也许来源于我自己作为伊利诺斯州皮奥里亚市的犹太移民之女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来源于我在成长过程中在皮奥里亚获得的注重可能性的实用观。一直到长大成人，我才在父亲的鼓励下离开这块地方）。随后，我从学院毕业，成了一名劳工报刊的记者。那些年里，我学会了洞穿词藻甚至心理学的迷雾，直逼美国现实中肮脏的经济内幕。作为一名记者和作家，我学着获取故事，其答案在刚开始时从来都是未知的；作为一名初学者，作为一名心理学和社会科学学生（先在史密斯 后在伯克利）我学着测试假说，倾听患者自己言行中的隐密线索。真够奇怪的，我现在还记得，在一个女工占大多数的电力总厂，当工人们卷入一次例行公事的罢工时，我发现那些妇女们不仅受到公司的歧视，而且在工会中也受到歧视，此时我的情感是很好笑的，几乎对这种歧视有所认同。那时没人对歧视女性感兴趣。我甚至在自己因为怀孕而被我工作的报社解雇时，对性别歧视也未置一词。

不过，促使我觉醒的首先是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我有着全部高水平的教育，以及成为一名未来的心理学家或记者的辉煌前程，我自己却欣然接受了女性的奥秘，并且身体力行。因为执意要寻找那种我母亲未能获得的自我实现，我首先决定放弃心理学研究生奖学金，随后甚至放弃了报纸记者的工作。我过着郊区

家庭主妇的生活，这种生活是那个时代所有人的梦想。1974年，《纽约》杂志曾请我回顾一下在25年前（即1949年，正是在这一年，女性的奥秘给我们以真正的冲击），身为一名妇女会是怎样一种情形。自然，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只是身体力行女性的奥秘，就像那时其他大多数二三十岁的妇女一样。只是到了现在，我才明白，女性奥秘原来是对那场必要演变的负隅顽抗。无论是我，还是我们中的任何人，都无法长期逃避那场演变。那场运动给我们带来了新生，使我们成为一种新型的妇女，最终，使我们能在人类社会中直面我们的人格。

我们一九四九年的生活方式

——一九七四年

1949年，我正集中精力以母乳哺育我的第一个孩子丹尼，推着他去公园，阅读斯波克医生^①的著作。当我的产假结束时，我开始陷入迷惘，不知自己究竟是不是真的想回去工作。我买了高压锅、《烹饪的乐趣》以及乔治·尼尔森著的《现代家居》一书。一个星期六，尽管我们两手空空，我们还是去了洛克兰县，去看那些老谷仓，也许我的丈夫能将它改造成一个家。我竟然还写信给我的母亲，说我想要那件纯银器皿（那是她曾作为一件结婚礼物送给我们的，我却嘲笑它们太布尔乔亚^②了）。

正是在那一年，女性的奥秘真正出台，尽管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它为何物。正是在此时，我们的生活似乎是飞鸟各投林。从史

① 斯波克医生(Dr. Spock 1903--),美国儿科学家。其《婴幼儿保健常识》一书，对二战后养育孩子的父母影响深远。

② 布尔乔亚(bourgeois)，此处指具有中产阶级保守性的人、追求物质享受的人或平庸粗俗的小市民所具有的性格特征

密斯及瓦萨女子学院毕业后来到纽约的一伙人，曾在威尔治共租了一个公寓，组成我们自己的团体，此时，这个团体的最后一拨人正纷纷结婚。战争期间，我们有诸如“调查员”或“编辑助理”一类的工作，在报业协会俱乐部会见大兵们，给那些和我们青梅竹马的寂寞男孩写 V 邮递^①信件，同已婚男人谈情说爱——把我们的子宫帽藏在梳妆台里的紧身裙下。我们自认为是工人阶级革命先锋的一部分，前往参加麦迪逊广场花园的马克思主义者研讨小组和集会，对像我们父辈那种沉闷的、布尔乔亚的资产阶级分子充满蔑视——尽管我们还在吹风机下阅读《时尚》杂志，将所有的薪水花在伯格多弗和班得尔商店里的衣服上，用大减价时买的黑色开司米及古奇^②手套取代了我们大学时的杂牌套头衫。

随后，与我们同龄的男孩们从战场归来。我在一家小劳工通讯社的工作突然被一个回乡的老兵取代，而要找到另一个我真正喜欢的工作相当不容易。我填写了我以前经常嘲笑的时尚生活调查员申请表。我认识的所有女孩都有类似的工作，但官方政策规定，那些身为妇女的调查员，不论她们多么优秀，都永远当不上作家或编辑。她们可以写出整篇文章，可总是和她们一起共事的男人获得作者的署名。那时我肯定还不是个女权主义者——我们中没有一个人对妇女权利有丝毫兴趣——可我永远不会让自己接受那种工作。不过除此而外，还剩下其他什么工作呢？我们中的一些人曾为之工作的战时政府机构正在解散。位于威屋利广场的团体解体了——麦姬、哈蕾特、麦德兰（人人都忙着结婚（阿比·洛森塞尔正热切地等待着搬进那套公寓，以便他能够结婚））。

^① V 邮递 (V-mail)，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军军邮，V 表示胜利。
^② 古奇 (Gucci)，设在纽约的一家意大利皮货店，其生产的皮鞋及皮包一向为高贵的象征

在战争刚刚结束后要找到一间公寓可真是难上加难。我离开了以前的小团体，在西街 86 号一幢市镇救济院的地下室里找到一间很不错的公寓。你得穿过锅炉房才能进入公寓，天花板上各种管道纵横交错，浴室里冷水装置形同虚设，假如你要洗澡，就得提前一个小时拧开热水。那里甚至连一间厨房也没有，当然我对烹饪没什么兴趣，也就不把这一点放在心上。房子里有一堵砖墙和许多架子，

还有一个阶梯出入口。当在欧洲经营了一家士兵演出公司的卡尔·弗里丹回归故里，在新泽西开了一家夏季剧院时，他最好的一个朋友（这人是我的同事）告诉他说，自己认识一个不错的有公寓的女孩。弗里丹给我带来一只苹果，说了些令我捧腹大笑的笑话，然后就搬了进来。我们在市政厅结了婚，可为了他的母亲，又在波士顿一位犹太教士的主持下重新举行了一次婚礼。当我在医院里生丹尼时，他则在油漆天花板上的管子，在储藏室外搭一间厨房，把我们的床搬到起居室里，好让丹尼能有一间婴儿室。

战后，我一直对政治兴趣盎然，热切投入，明显带有激进色彩。我发誓，这与妇女问题无关。1949 年，如果你是个激进分子，你就会关心黑人、工人阶级、第三次世界大战、非美行动委员会、麦卡锡^①和效忠宣誓、苏联、中国和联合国，但你肯定不会从政治角度思考身为妇女的问题。我们开始全面考虑作为妇女的我们自己，只是最近的事。然而这不是政治的——它与政治格格不入。带着八个月的身孕，我曾爬上置于街道角落的一把梯子，

① 麦卡锡 (Raymond McCarthy 1908 - 1957)，美国共和党参议员 (1949 - 1957)，20 世纪 50 年代初煽起全国性反共运动指控有大批共产党人渗入国务院和军队，并进行大肆迫害。

② 效忠宣誓 (Oath of allegiance)，美国移民法所规定的在移民归化美国前进行的一种宣誓。

为亨利·华莱士^①作讲演。但在 1949 年，我突然就对政治集会不再那么感兴趣了。

我们中的一些人开始去看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医生。据说我们都发现，就像莫丝·哈特著的《黑暗中的女子》中的女编辑一样，我们真正想要的是一个男人。不论生理的、意淫的现实如何，一位妇女如果遇到以下几种情形，便几乎没有情绪去反驳这一论点：(a) 她很寂寞，厌倦了独自生活；(b) 她将失去工作；(c) 她心存的幻想已开始破灭。1949 年，没有任何人真的非得告诉某个妇女，说她想要个男人，但这个论点肯定已开始全方位地困扰我们：家务劳作的快乐突然变成了高雅的、复杂的，无论是什么使你想成为一名女编辑、刑事案专访记者或政治活动家，都可能阻碍或破坏那种快乐——布尔乔亚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不再受到鄙视。

杂志上诸如此类的文章连篇累牍：《美国妇女怎么了？》《让我们别再责备妈妈》《男人短缺》《妇女的位置不是在家中吗》《女人不是男人》《女人能向夏娃母亲学些什么》《真正男人的世界 政治学》以及《在〈名人大词典〉中的妇女有近一半是单身》。

我们仍在吹风机下阅读的妇女杂志上的短篇小说，写的全都是在纽约有份假定可人工作的苦闷女孩，她突然看到光亮，于是回家去嫁给亨利。在《宝贝 别哭泣》（《麦考尔》杂志，1949 年 1 月号）中，女主人公正在读一封她母亲写来的信：“你应该回家来，女儿。像那样独自生活，你是不会快乐的。”在《欢声雷动》（《妇女家庭杂志》，1949 年 3 月号）中，一个年轻女子对她那位梦想当演员的可怜母亲心怀怜悯，她自己甚至在可能受到这类梦想的诱惑之前就要结婚了。

我特别难以忘怀的是，发表在《麦考尔》杂志 1949 年 12 月

^① 亨利·华莱士 (Henry Wallace, 1888—1965)，美国副总统 (1941—1945)，反对美国冷战政策，曾为进步党总统候选人，后脱离该党

号上的题为《与爸爸共度的一个周末》的小说，给一度想成为一名心理学家的我所带来的灼疼影响。一个小姑娘，同她那离了婚、有头脑、无所不知的心理学家母亲一道过着孤独的生活。她来到乡下与父亲及其新妻共度周末。父亲的新妻健康、快乐是一位不错的厨师和花匠。那里充满了爱、欢笑、盛开的鲜花、热腾腾的蛤蜊、精美的奶酪煎蛋，还有广场舞会，小姑娘不想回家了。但是，出于对在孤寂的公寓里一个劲地打字的可怜母亲的同情，她把自己的内疚深藏于心，这个藏在她心底的秘密是，从现在起，她将为这样一个时刻活着，有朝一日，她将可以逃到乡下的梦中之家。只有在那里人们才知道“什么是生活的全部”。

我记得，大约就在那时，我与一位真正的心理学家不期而遇。她是位妇女，年龄略长于我，我在研究院时就认识她了。她聪明非凡，雄心勃勃。不像我，她接受了研究生奖学金，拿到了哲学博士学位。现在她在做些什么呢？我结婚了，她用一种非常陶醉的语气说：“我怀孕了。”当我问她时，她说她去地铁站接她的丈夫。这我理解，因为在1949年我也受到奥秘的感染，也就是说，几乎不论什么样的男人，他都会成为你实现自我的工具。令我吃惊的是她新的心理意识的力量与真诚，她竟会到地铁去找他。

那一年，在30年代和40年代曾风靡于杂志和电影的最后一批朝气蓬勃、勇敢无畏、富有冒险精神的女主人公成为绝唱。格丽泰·嘉宝、墨娜·劳尔、蓓蒂·戴维斯、罗莎琳·拉塞尔、凯瑟琳·赫本扮演的这些女主人公最终都得到了自己的男人，但她们通常都在不懈地努力工作，以实现她们自己的某个目标或幻梦。她们独立、果敢、充满激情地投身于世界之中。她们不如后来的道丽丝·戴式的小家庭主妇，在追逐男人方面使尽浑身解数，也不如她那样小猫一般顽皮兮兮，而男人们对她们灵魂的热爱一如对她们容貌的倾心。“事业型妇女”在50年代成为一种

带贬义的称呼，是纵情声色、以吞食男人为乐的希腊女怪的代名词，是痛苦的、有些神经质的女巫，男人和孩子都应从她身边逃走，去过美好的生活。

1949 年 3 月，《妇女家庭杂志》刊载了赞颂《职业：家庭主妇》的最早文章。随着这篇文章的刊出，无数类似的赞颂文章开始出现在妇女杂志上，并将以疾风暴雨之势把妇女杂志带进 60 年代。这类颂歌开头总有这么一位妇女，她怨气冲天地说，当她在人口调查表栏内不得不填上“家庭主妇”的字样时，她有了自卑感“我在填表时意识到这就是我，一个中年妇女，受过高等教育，一生碌碌无为。我只是一个家庭主妇。”于是颂歌的作者以哄然大笑作为答复，不知怎么回事，这些作者自己从来不是家庭主妇（此处作为例子的是多萝茜·汤普森，报界女性，驻外记者，著名专栏作家）她叱责道：你的毛病在于你根本没有意识到你同时是十几个行业的专家。“你可以填上：企业经理、厨师、护士、司机、服装师、室内装潢师、会计、宴席承办人、教师、私人秘书——或者干脆填上慈善家……为了爱，你毕生都在奉献你的精力、你的技艺、你的才智、你的服务。”可是家庭主妇仍在抱怨：我都快 50 岁了，可我从未干过我年轻时梦想做的事——音乐。我浪费了我的大学教育。

哈哈，汤普森小姐大笑起来：不是正因为有了你，你的孩子才有那样的音乐天赋？在你丈夫完成其皇皇巨著的那段拮据岁月里，难道你未曾以一年三千美元的收入维持一个美满的家庭？难道你未曾亲手糊上起居室的墙纸，像鹰隼一样瞄着市场上出售的廉价商品？略有空闲时，难道你未曾替丈夫打字、校对手稿？你未曾同孩子一起弹二重奏，以增添他们练习钢琴的兴趣？你未曾读孩子们的课本，以便能跟得上他们的学业？“可所有这些通过他人的经验感受的生活——都是通过他人得来的。”家庭主妇叹息道。“就像拿破仑·波拿巴那样通过他人的经验感受生活，”

汤普森小姐揶揄道，“或者像一位王后。我可不能接受你的自我怜悯。你是我所知道的最有成就的妇女之一。”

那一年，《妇女家庭杂志》连载了玛格丽特·米德^①的《男性与女性》，她以欺人的、诱惑的笔调谈及南太平洋原始部落，那里，妇女大获成功，仅仅因为“身为”一个女人受到男人们的嫉妒。

在巴厘岛^②，两岁的小女孩走路时，多数时间里都故意地挺出小肚子，她们经过年长些的妇女身边时，这些妇女就会开玩笑地拍拍她们的肚子：“有喜了。”她们用逗弄的口吻说。于是小女孩得知……将来有一天她会生个宝宝，而总的来说，生宝宝，在小孩子眼中，是她们那个简朴世界里最激动人心、最引人注目的成就之一，在这个简朴的世界中，某些地方最大的建筑物仅有十五英尺高……此外，小女孩知道，她将会生宝宝，并非因为她强壮有力、精力充沛，或者有首创性，也不是因为她劳作、奋斗或尝试，最终取得成功，而不过因为她是一个女孩而非男孩，少女变成了妇人，最后——如果她们保护了自己的女性气质的话——生下宝宝……按照我们西方的人生观，女人是用男人的肋骨造就的，她至多能徒劳地竭力模仿男人的卓越才能和崇高职业。

在一个最大的建筑远远超过十五英尺高的日趋复杂的世界里，试图一如既往地以你怀孕的肚子渡过难关，那是有轻度精神

^① 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 1901—1978)，美国女人类学家，以研究太平洋无文字民族而闻名，在心理学及文化领域也成绩卓著。本书作者在《女性的奥秘》一书中曾对其理论进行过批判。
^② 巴厘岛(Bali)，印度尼西亚南部的一个岛屿。

分裂症状的——罢了，我们只是在那之后才意识到这一点。在 1949 年，我们无法抗拒那只苹果的诱惑——我们可以退出竞争，退出属于“男人的崇高职业”的那枯燥、艰辛的工作，只需简单地“扮演我们作为女人的角色”。无需再同男人捣蛋，冒失败或招致男人憎恨的危险。

那一年，《妇女家庭杂志》还连载了《大家庭 小花费》，一个女工程师的故事。她运用自己科学的专门技巧，养育了十几人的新型大家庭。非常优秀的记者都接到指派，纪实性地描写富有魅力的新型美国家庭主妇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她用全副的新式装备，在自己的厨房里烹饪。1949 年秋天还有报道说：“在美国，婴儿出生率出现了新情况。从 1940 年到 1947 年期间，大学毕业的妇女的生育比例提高了 81%，相比之下，那些只完成小学学业的妇女，生育比例只提高了 29%。”

可以肯定地说，那时，我们中的任何人，即使是最激进的，也未曾意识到，那些向我们倾销洗衣机、烘干机、电冰箱和二手汽车以获取巨额利润的公司，正在向我们夸张地吹嘘家务劳作的快乐，以期卖给我们更多的东西。即使是我们当中最激进的分

子，都天真地想要那些高压锅。

身为妇女，我们在世故中甚至更显天真。尽管离开大学来到纽约时，我自己还是个彻头彻尾的处女。为我们整个史密斯校友团体安排堕胎事宜却成了我命定的任务。为什么由我出面？因为我很激进，又是个心理学家，坚定不移（我知道所有弗洛伊德理论的术语）。更实际的是，身为一名女新闻记者，我理应见多识广战争期间与我共事的男记者，必然超过了征召服役的年龄，他们是那种总上头版的人物，午餐时的三杯马提尼酒下肚后，会教我如何写一位爵士乐主唱歌手。在我天真的心目中，他们都叔伯般慈爱，只偶然有些轻佻的越轨之举。第一次我说：“伙计，你们得帮帮我。我的一个朋友怀孕了。”这时，整个办公室都立即行

动起来。在严肃、不祥的秘密气氛中，我被告知将我的“朋友”带到哪里去。那也要花费一千美元，他们关心的是我的“朋友”从哪里去弄到那么多钱。六个月以后，我不得不再次求助于他们。这次的反应不再那么热烈了。好多年后，我才意识到，他们都猜测每一个需要堕胎的“朋友”就是我。

我自己从未堕过胎，可我曾私下里陪同这些朋友中的几个到过那令人毛骨悚然、杀气腾腾的黑屋子，曾分担她们对那些诡诈狡黠、油腔滑调的非法手术者的恐惧和疑虑，坐在屋子外面，听着撕心裂肺的尖叫声，一边想着如果她们死了，我该如何是好。事后，我再将她们弄到出租车中。现在读着这本书的亲爱的弗吉尼亚贞女^①们——当我们的努力使你在纽约州获得了合法堕胎的权利，高等法院做出历史性的裁决，宣布你有权控制自己的身体、性隐私、节育和堕胎时——你无法想像，在 1949 年，需要堕胎是多么令人羞辱难当、饱受创伤、恐怖异常。如今你们的父母甚至会为你买来避孕药，所以你们也肯定无法理解，在 1949 年的纽约，如果你没有结婚——有时，即使你结了婚，为了搞到子宫帽所需承受的那种身败名裂的下场。

团体解散时，我的最后一项任务是寻找一位圣公会牧师，以便麦姬和罗格能在一所她母亲可以接受的可爱教堂里成婚。可是在 1949 年，甚至连一位和平主义者的牧师也不愿为一个离过婚的男人主持结婚仪式。要找到这样一个牧师，比寻找做堕胎手术的人还要难。在我们接受了女性的奥秘之后，离婚是无法想像的。事实上，1949 年，在我个人所认识的妇女中，没有一个自己有过离婚的经历，而这种情况在十五年后依然真实。十五年后，在自己郊区的梦中之家的保护下，我第一次面对自己可能离婚的威胁时，恐惧得瘫软成了一团。

① 弗吉尼亚贞女 (Virginia)，罗马神话中，为免受执政官污辱而由父亲杀死的少女。

“安全”是在 1949 年开始发生的事情中的重头戏。“安全”正如“风险”是报刊的头条。就像核秘密、议院非美行动委员会、忠诚宣誓，以及建立作家黑名单。它成了无意识的政治退却，那么多曾勇敢直言、游行示威的人们，突然退回到郊区私人住宅的高墙环绕的安全保护之中——一切都是“布尔乔亚”的。突然间我们不再使用“布尔乔亚”一词。看上去我们跟自己的父母没什么两样。突然间我们对房子和什物的兴趣陡增。椅子、桌子、银制器皿。我们去现代艺术博物馆，研究现代建筑的家具和陈列，买回我们第一批财产——几把埃姆斯椅^①、一张淡色自由造型的野口勇^②餐桌、一张赫尔曼·米勒牌供昼间坐卧的床，配有朴素的花呢蒙面的床垫和长枕垫，如此摩登，与家中厚墩墩的、有簇饰的靠背扶手长沙发（现在我回想起了它们的舒适）迥然有别。

到那一年年末我在《时代》杂志上读到一则消息：在昆斯区有一个新型花园公寓社区，名叫公园路村，是为联合国而建，有一些提供给退役老兵的空屋。拥有了它几乎就像拥有了你自己的房子：公寓有朝向一块公用草坪的落地窗，孩子们自己就可以去草坪玩耍，而不需要让大人带着到公园去。那里还有一所合作托儿所。利用午餐时间，我乘坐地铁到了昆斯区的未垦区。就这样，为自己远离城市的特殊核心家庭，我开始了为时十五年之久的长途奔波，到昆斯区的那所花园公寓，到一所位于斯内登集材场的出租老屋，到位于洛克兰县的、我们自己的查尔斯·亚当斯·维克托利亚房子（它有十一间屋子，在那里我的孩子们增加到了三个）长大成人，我开车，参加家长教师联谊会，做晚餐，当郊区的邻居前来喝咖啡时，我就像一大早偷着喝酒的人一般，心虚地将正在写的《女性的奥秘》藏起来。

① 埃姆斯椅(Eames chair)，美国人 Charles Eames 设计的一种模制的胶合板或塑料椅子。

野口勇(Noguchi 1904—)，美国雕刻家、设计家。

我觉得，我永远也不会再像住在昆斯区时那么快乐了。地板是拼花木地板，天花板用泥灰铸模而成，上面没有横七竖八的管子，水泵工作情况良好。房租是每个月 118.50 美元，共有四间半房子，在我们看来那已奇大无比了。而今，我们的朋友都是像我们一样的夫妻，带着上托儿所的孩子，当我们在超市推着购物车走动时，他们在车筐里互相尖声叫喊着。起先，在那些新型超市购物挺有意思。我们买了烧烤架，用酸奶酥和无奶油的洋葱汤调制沙司，好与马铃薯片相佐配，而我们的丈夫们则像在城里一样调制干马提尼酒，在木炭火上烤汉堡包我们坐在置于宽大的台阶上的帆布椅中，心想，我们那些在暮色中玩耍的孩子看上去是多么漂亮，我们大家是多么幸运，愿这样的情景天长地久。

在我们的团体中，共有六个家庭，如果你的孩子在下水道盖子下弄破了手指，你又不在家，其他家庭的某个成员就会带他去看医生。我们在过感恩节、圣诞节和举行逾越节家宴^①时，就像是一个共同的大家庭。到了夏天，我们在乔治湖或烈炎岛共同租房子住，那房子是我们独自负担不起的。我们相互给予的支持掩盖了我们自己婚姻的裂痕——或许阻止了这些裂痕加深。实际上，在六个家庭中，现在有三对夫妇离了婚，一个家庭因自杀而破裂。

生孩子，按照斯波克医生的著作进行婴幼儿护理和喂养，我们就这样开始建构起了我们的生活。它取代了政治的位置。可奥秘还有点别的东西——大学毕业生应当将为母之道作为自己的职业，不只是生一个或两个孩子，而应该生四个、五个、六个孩子。那为什么还要上大学呢？

我还记得，我们怀着极大的热情到产妇中心去参加学习班。我们的丈夫们有些嫉妒，但随着孩子的自然降生，丈夫们也可以

^① 逾越节家宴(Passover Seder)，犹太人的宗教节日宴会，通常在犹太教历尼散月的 15 日和 16 日举行。

参加学习班了，与我们一起做呼吸训练，在晚上炫耀，在地板上做练习。随后，围绕我们的哺乳，又出现了道德上、政治上的严肃事件。在 1949 年的夏天，我因为在我丈夫的夏季剧院的前排台阶上当众给孩子喂奶而受到指责。那时，这种做法还不流行。可它是那么自然，我们夸耀着，对我们那些浅薄的姐妹只感到轻蔑，她们认为用母乳喂养孩子是动物行为，会有损她们的形象（实际上，我并没有在公众场合给孩子喂奶——我退到光线昏黑的剧院的后排，剧院里正在进行彩排。但我后来真的坐在了剧院前的台阶上，在阳光下轻拍孩子的背，让他打嗝）。我是多么自豪啊，将近整整一年中，即使是在奶水开始耗尽、我不得不想方设法为奶瓶消毒之后，我都继续给孩子哺乳。那一年产假结束前的一个月，办公室坚持要我回去工作，因为产假打乱了工作日程，这时，我是多么焦虑不安啊。

所以，25 年后，当我那已长大成人的儿子同女朋友闹矛盾时（他自己知道弗洛伊德学说的术语，假如他还不知道斯波克医生的语汇），说他在恋爱中的不安全感全是我的错，我仍旧感到内疚的刺痛，这种内疚感源于我把自己的第一个孩子扔给了一个保姆，自己却回去工作。如果斯波克医生没有在《母亲是否应该工作》一节中说过那样的话，所有这些内疚感是否还有必要？他说：“在大多数情况里，母亲是给孩子这种‘归属’感、安全感和保护感的最佳人选……如果一位母亲清楚地意识到，这种照料对幼儿来说是多么重要，也许她能比较容易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她可能赚到的那些额外的钱财，或她从户外工作中得到的满足感，原来并非如此重要。”

说实话，那些年中，除了“女性的奥秘”，还存在一些其他的東西。我仍记得 1949 年春天那个奇妙的暗夜，我们用婴儿车推着丹尼回家时的情形。当我们从一盏街灯下走过时，我俯下身去看他，他冲我笑着。从他的眼中可以看出他认得我。有一个人在

这儿，他认识我。

此外，在那一年及以后的许多年里，比起你也许不那么想得到的、而且你清楚无论怎么努力也不会有什么进展的臆想中的“职业”来说，那种现实——孩子、奶瓶、烹调、尿布、奶嘴、婴儿车、高压锅、烧烤、游戏场地以及“一切自理”（doing — it — yourself）——要舒适、安全、可靠、满意得多。职业也会让你产生出某种内疚心理：你想要出人头地，要荣誉，如果登在报上的文章中的主意是你出的，甚至是你写的，你还会要求署名，不知何故，在人们看来，这便是你的错，是你争强好胜而爱出风头。当男人们到某个女人禁止入内的酒吧去吃午餐或谈论本行事情时（即使那些男人中的一员单独请你去另一种餐馆用午餐，在台布底下握着你的手，或者膝盖），如果你觉得遭到了排斥，这也是争强好胜而爱出风头。就某一方面而言，在这种办公室中工作是令人不快的、不真实的。尽管“事业”仍促使你向前。可你简直无法用言语形容那种障碍，哪怕是承认它，不知怎的，你也永远无法逾越那种障碍。它使你变成一个隐身人，让人们不拿你当回事，让你感觉到自己是那么彻头彻尾地无关紧要，几乎是微不足道，而且让你如此愤怒——尽管这愤怒埋藏得很深。

而在家里的，你是不可或缺的，你是重要的，你是老板，事实上——是母亲——新奥秘赋予母亲以职业的合理依据。

在某种程度上，与精神分裂症相比，乃至与我们过去常常自命为其急先锋的世界革命的危險政治相比，另外一些东西要更真实、更可靠，譬如你可以自己动手做木工活，可以从事具体而微、伸手可及、实实在在的烹饪工作，可以给校董会、分区制^①和社区政治带来效果令人惊讶的变化。在1949年的美国，革命显然不会以那种方式爆发：工人阶级也想要高压锅。至少你可以认

^① 分区制（Zoning），将城市按一定原则分成“工业区、商业区和住宅区的分区规划。

为，即使共产主义威胁的神话大多是扣上赤色分子帽子进行政治迫害的借口，目睹工会内部、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发生的一切，也是令人大失所望的。在 1949 年 麦卡锡主义、与俄国作战的危险、美国法西斯主义的危险，以及美国帝国的共同财富和权力的现实，都使一度有改造世界的远大抱负的男男女女，对老左派^① 革命的花言巧语深感不适。

近郊、远郊，加上孩子做借口——这里有一个舒适的小世界。在这里，与原子弹爆炸相比，你可以有一些真正的政治作为，比如孩子们的家庭作业，乃至新数学。

女性的奥秘使妇女更易沾沾自喜地退却，男人拼尽全部才智销售可致癌香烟或防臭剂时，也许会有良心上的巨大痛苦和自卑感，而女人则没有。我们善良清白，无牵无挂，甚至有些自鸣得意地蔑视那些可怜的男人。奴颜婢膝和激烈竞争必然带来溃败，男人们可难以像女人那样轻易地逃避这种溃败的必然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女人仿佛在那场竞价中取得了优势。只是到了后来，我们中的一些人才发现，也许我们曾心甘情愿地作为牺牲品，漫步走进了一个舒适的集中营。

1949 年以后不久，我因为再次怀孕而被解雇。他们不愿忍受另一次产假带来的麻烦，尽管我的工会合同赋予了我这样的权利。不管怎样，仅仅因为我怀了孕就解雇我，雇一个男人来顶替我，这是不公平的，是错误的。我甚至试图召集一次我工作单位中的工会成员会议。我猜那是我自己的女权主义的第一次个人活动。可对我的这种做法，其他妇女只是感到难堪，男人们则大惑不解。再次怀孕是我自己的过错，是件个人事情，不是件你该扯到工会来的事。在 1949 年，尚没有用来称呼“性别歧视”的词。

^① 老左派(Old Left)，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受到共产主义思想影响的左派人士、成员主要是激进的知识分子。